

論基督教文化 在中國小說的當代電影改編中的移置*

陳偉華

[提要] 基督教文化在當代中國電影中逐漸得到顯現。以含基督教文化因素的中國小說的當代電影改編為考察視角，深入分析《狂》、《青春萬歲》、《第一次的親密接觸》、《金陵十三釵》、《一九四二》等電影及其原著，可見基督教文化在中國小說的當代電影改編中並非完全依原著狀態呈現，而是在諸多方面發生了移置。其具體表現在：部分教徒身份發生了轉移；一些基督教語境被置換；一些基督教文化符號被去掉。從小說到電影的過程中，電影更側重呈現正面基督教形象，而有意省略了原著中關於基督教的負面表達。基督教文化移置現象的出現，既有藝術的原因，也有著複雜的社會文化原因。

[關鍵詞] 基督教文化 中國小說 電影改編 移置 《青春萬歲》 《金陵十三釵》

[中圖分類號] J90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6)02-0196-08

基督教文化元素在中國當代電影中比較少見。迄今為止，具有基督教元素的電影屈指可數，且大多數改編自小說。相關電影代表作有《青春萬歲》（1983年出品，改編自王蒙的同名小說，黃蜀芹導演）、《狂》（1991年出品，改編自李劫人的《死水微瀾》，凌子風導演）、《第一次的親密接觸》（2000年出品，改編自痞子蔡的同名小說，金國釗導演）、《高興》（2008年出品，改編自賈平凹的《高興》，阿甘導演）、《唐山大地震》（2010年出品，改編自張翎的《餘震》，馮小剛導演）、《金陵十三釵》（2011年出品，改編自嚴歌苓同名小說，張藝謀導演）、《一九四二》（2012年出品，改編自劉震雲小說《溫故一九四二》，馮小剛導演）。相關作品雖然較少，但從歷史發展軌跡來看，基督教元素在中國當代電影中有增多的趨勢。在這些改編自小說的電影中，基督教文化並非完全依照原著中的情形出現，而是表現出移置的狀態。深入分析這種現象，可以發現它們表現出了較為典型的類型，其背後有著相當複雜的原因。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小說的電影改編研究（1905～2010）”（項目號：11CZW071）及“2014年度湖南省普通高校學科帶頭人培養對象項目”的階段性成果。

一、基督徒身份的移與植

當代中國大陸的電影中，真正的基督教徒形象極少。小說原著中的教徒形象往往不能原貌在電影中出現。從小說到電影的過程中，一些教會人物被移置。表現為多種形式：普通人臨時變身為神聖教徒；有劣跡的基督教徒被隱去；人物被增加了教會學校學習的經歷。

上述三種情況有時單獨出現，有時在同一部作品中出現。在《金陵十三釵》中，基督徒身份的轉化表現得特別突出。小說原著中的神父為真神父，電影新增人物殯葬師約翰·米勒。小說原著中的主角英格曼神父在出場時即已去世，約翰·米勒奉命前來為神父殯葬。電影詳細地表現了約翰·米勒由殯葬師到神父的身份轉變過程。日軍士兵進入教堂，追逐著女學生們，並打算強暴她們。此時，約翰·米勒挺身而出，以教會和神的名義進行抗議。約翰·米勒由此從心理和精神上完成了由殯葬師到神父的轉變。小說原著中，英格曼神父是主角。小說多處描寫了英格曼神父對女學生們的保護。英格曼神父每天晚上祈禱前都登上鐘樓頂層，看著東邊越來越近的火光，祈禱越來越長。^①小說還詳細地描寫了英格曼神父被日軍殺害的情形：英格曼神父瘋了似的，撲向日本兵。他剛靠近就被一把刺刀制止了。刀尖再次戲弄地在他臂膀處劃出個裂口。^②電影則隱去了英格曼神父被日本兵刺殺的情節，僅在影片開頭告知觀眾，英格曼神父不幸遇害去世。電影另設臨時化身神父的約翰·米勒來承擔原本屬於英格曼神父的敘事功能。作為普通民眾，殯葬師約翰·米勒在事件當中曾有多次單身而退的機會。但在神聖的教堂裡面，他選擇了堅守，選擇了保護女學生們、妓女和受傷的中國士兵們。約翰·米勒的行為也可以說是一種大眾的“普愛”，但因為他身處教堂，讓人更有理由相信，這是由於基督教的犧牲和愛的精神的感染。

在《金陵十三釵》中，還有多人也被移置了基督教文化因素。小說原著並未提及玉墨與基督教文化的關係，電影給她增加了教會學習的經歷。小說如此介紹她的經歷：她四書五經也讀過，琴棋書畫都通曉，父母的血脈也不低賤，都是讀書知理之輩，不過都是敗家子罷了。她十歲時被父親抵押給賭頭堂叔。堂叔死後，堂嬸把她賣到花船上。十四歲的玉墨領盡了秦淮河的風頭，行酒令全是古詩中的句子。^③由此可見，玉墨出身不大好，在賭頭堂叔家和花船上長大。電影中，玉墨告訴約翰·米勒，她在教會學校裡呆過六年。基督教文化在中國人身上的移置，展示出基督教文化的跨國際、跨人種的影響力。風塵女性得到基督教文化的感化，益發突出基督教文化的教化作用。

妓女形象在《聖經》裡面多次出現，《路加福音》^④和《約翰福音》^⑤所載“耶穌與罪婦”的故事廣為流傳。妓女行善在基督教文化裡是一種自我救贖行為。玉墨等妓女的義舉，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聖經中的救贖故事。

除了玉墨，陳喬治身上也被移植了更多的基督教文化因素。小說原著中，陳喬治是英格曼神父撿的乞兒。他去學了幾個月廚藝回來之後，給自己改了個洋名：喬治。^⑥小說詳細地交待了陳喬治被日軍殺害的過程：中佐脫下白手套，用食指指尖在陳喬治額上輕輕摸一圈。他是想摸出常年戴軍帽留下的淺槽。但陳喬治誤會他是在挑最好的位置砍他的腦瓜，他本能地往後一縮，頭躲了出去。中佐本來沒摸出所以然，已經懊惱不已，陳喬治這一舉，他“刷”的一下抽出了軍刀，陳喬治雙手抱住腦袋就跑。槍聲響了，他應聲倒下。^⑦在電影《金陵十三釵》中，陳喬治沒有被日軍士兵所殺害。他的個人形象也由普通教徒轉化為聖徒。為了保護年輕的女學生，他主動請求假扮女生，代替女學生去為日軍唱詩表演。

電影《金陵十三釵》對阿顧的處理，也表現了對基督教文化的移置意圖。小說裡，阿顧是看門人，貫穿小說始終。老顧告訴妓女們教堂為她們提供保護，由此得到紅菱等人的伺候。這個人物放在教堂之中，與基督教的精神和教堂氛圍不大和諧，會褻瀆教堂的神聖性。電影則通過陳喬治之口指出，阿顧是廚子，日軍進來時逃跑了，從而巧妙地移去了這一有違基督教精神的人物，同時也借此維護了基督教的良好形象。

整體看來，在《金陵十三釵》中，基督教因素在人物身上的移置現象表現得十分突出，類型也比較多樣。這些移置有著豐富的內涵，得到基督教文化移置的對象涵括了神父、教徒以及普通民眾等各個層次，由此在電影中營造出一股濃郁的基督教文化氛圍。

在小說被改編成電影的過程中，部分次要神職人員被一筆帶過或刪除。這一現象在《金陵十三釵》、《青春萬歲》等小說的電影改編過程中表現得很突出。小說《金陵十三釵》中的法比·阿多那多神父在電影中也沒有出現。在小說中，法比阿多那多三歲時，父母在傳教途中染了瘟疫，幾乎同時死去。他由一個中國教徒收養長大，二十歲上投奔了英格曼神父，從此皈依了天主教。後來英格曼送他去美國深造了兩年，回到中國便做了英格曼的助理。因此法比·阿多那多可以作為中國人來自省其劣根，又可以作為外國人來審視中國的國民性。面對這群窯姐，他的兩種人格身份同時覺醒，因此他優越的同時自卑，嫌惡的同時深感受莫能助。^⑨後來，阿多那多腿部被日本人用槍打中。^⑩由這些文字可知，法比·阿多那多是一個熟悉中國和中國人的基督徒。然而，在與日軍士兵抗爭的過程中，他並沒有太多突出的表現。略去該人物，既可以使電影的情節更為集中，也可能節約表演的人力，同時還可以在一度程度上避免沖淡基督教對受難民眾的拯救作用。

一些有劣跡的神職人員也在電影中被略去。如在《青春萬歲》中，原著中的黃神甫、李若瑟等神父被去掉，只留下雷姑奶奶（嬈嬈）。很顯然，刪除這些有劣跡的神職人員，有利於減輕基督教文化的負面信息。《青春萬歲》中，一些壞傳教士對教徒先施以恩惠，然後灌輸觀念，他們還把對共產黨的錯誤認識傳遞給教徒。呼瑪麗很多的錯誤認識都來自於心懷惡意的傳教士李若瑟。在原著中，李若瑟成了呼瑪麗有生以來惟一的大恩人。呼瑪麗永志不忘，像對待父親一樣地對待他，把所有聖經、禱文所啟示的苦良德性，一齊獻給他。她暗自發誓，永世做若瑟神甫的奴僕。神甫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為了神甫她願意拋棄自己的一切。^⑪呼瑪麗上了初中之後，李若瑟天天對她講共產黨是魔鬼，共產黨一來教難就快到了，不信主的人都要下地獄，你要聽了他們的也要下地獄。呼瑪麗一方面很希望好好上學，好好聽課，另一方面恨不得把耳朵堵上，生怕“魔鬼的異端邪說”侵入自己的頭腦。^⑫呼瑪麗對義和團的不當認識也來自李約瑟神父。小說裡寫道：學校裡講歷史講到八國聯軍的侵略和義和團的英勇抗爭，這和李若瑟過去講的不一樣。她迷惑了，回去問李若瑟，神甫批評她聽信妄言謬說忘了天主的話。呼瑪麗嚇得倒退，她深深懺悔，並給自己下令，以後除了神甫的話，誰的話也不要聽。這就是她日後關於義和團問題，公開而堅決地表示自己態度的原因。^⑬

基督教在特殊的氛圍中體現出化腐朽為神奇的力量。由此，電影一方面突出了基督教文化的感化作用，同時也避免為教會直接唱讚歌的嫌疑。歌頌教會和教徒，在西方電影中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然而，在當代中國社會中，基督教文化尚不能象儒家文化一樣，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直接唱讚歌，可能會引起民眾的反感和不適。張藝謀導演的電影《金陵十三釵》在人物方面的處理，一方面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有著對大眾傳媒影響的考量，另一方面又在對基督教的移置方面表現出了較高的藝術性。也正如《青春萬歲》的導演黃蜀芹所指出：在人物塑造的真實性方面，我們

注重人物身上的時代烙印。如果我們肯定或者表彰了其不成熟的一面，會挫傷現代觀眾的感情，也違反我們自己對歷史的思考。^⑬

二、基督教語境的置換及基督教文化符號的隱顯

基督教事件和基督教物理空間的移置在從小說到電影的過程中也比較常見。在小說《第一次的親密接觸》^⑭中，不少事件都發生在聖誕節。但電影則將小說中的聖誕節換成了中國的傳統節日元旦或者新年。聖誕節在小說中經常出現，與聖誕節作為一個世俗的節日而存在也密切相關。但它作為一個與基督教密切相關的節日，不可避免地帶有宗教因素。很可能是為了避免傳教的嫌疑，電影有意將“聖誕節”轉換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常見時間符號“新年”。就效果而言，基督教語境被置換之後，電影中的基督教文化氛圍有所弱化。

在《青春萬歲》的電影改編過程中，出現了基督教空間的置換。在小說中，呼瑪麗成長的地方叫仁慈堂，電影則將其移置為孤兒院。在小說中，仁慈堂被描述為一個地獄般的地方，這裡使用童工，虐待童工，強迫女孩出嫁。“仁慈堂”在北京西什庫天主教北堂的旁邊。名義上這是慈善事業——“仁慈”的孤兒院，實際上卻是吸血的童工工廠，販賣人口的營業所和駭人聽聞的兒童地獄。“仁慈堂”的孩子們每天清晨四點鐘起床，望彌撒，然後幹一天活，念兩個鍾頭的書，晚上再做降福。每天三頓飯以前和睡覺以前，都要念經。他們從四五歲就開始做活，給大一點的孩子當下手。慢慢也學著做針線、剪花樣子、織條子和繡手絹，把綢子、細布繃起來。最初人矮繃子高，她們站一天，腳、脖子伸得生疼，轉都轉不動。後來漸漸長大，人高繃子矮，彎一天腰，腰酸得直不起來。^⑮“仁慈堂”的女孩子都是這樣，十五歲左右，小的甚至十二歲，就由姑奶奶做主嫁出去。而這些到“仁慈堂”撿“洋落”（撿“洋落”：北京土話，指用不正當的方法取得便宜、好處）的丈夫，則用幾塊銀元表示對於聖母的侍者——修女們的敬意。^⑯

儘管基督教堂中存在一些不良現象和不法事件，但它在客觀上起到了保護民眾的作用。《金陵十三釵》中，父母們把他們的孩子們留在教堂裡，一是圖美國和宗教對她們的雙重保護，再則，也希望她們的學業不致停頓。^⑰儘管實體的教堂不能杜絕黑暗的一面，但基督教本身卻不壞。呼瑪麗在仁慈堂中找到棲身之處，在《聖經》和教會活動中找到安全感。呼瑪麗在教堂中受到啟蒙教育，學會了識字。這個苦命的孩子，只有在祈禱的時候，才找到了在“仁慈堂”從未相遇的“仁慈”。宗教的力量，就像聖經上譬喻的尼羅河一樣，清澈久遠地灌溉著她的心田。^⑱教會裡正直的神父也對仁慈堂進行譴責：“他們壓榨童工，買賣人口，他們是法利賽人！”^⑲在小說中，黃神甫告訴呼瑪麗，有罪的不是她，是那些法利賽人，他們混到聖教會，執掌大權，胡作非為，真是恥辱！黃神甫勸呼瑪麗不要離群獨處，告訴她如果面酵離開了三斗面，麵團就無法發起來。^⑳

《聖經·馬太福音》第十三章把宗教譬喻作面酵，把世人譬喻作三斗面，意即宗教能帶動和感化全體。在電影《青春萬歲》中，有關孤兒院和教堂的介紹並不太多。從小說到電影，稀釋了對基督教的負面描寫。這種置換，一方面可以避免把觀眾帶入一個認識上的誤區，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教會的反感和抗議。

在小說被改編成電影的過程中，不少電影採取了隱去基督教文化符號，留下基督教文化思想的做法。這種情況在《金山》^㉑和《餘震》^㉒的電影改編中表現得比較突出。在小說《餘震》中，女主人公患有嚴重的地震後遺症。聖經音樂、教會的唱詩班也都成為她的治療手段。但電影《唐山大地震》把基督教作為療傷的方式和手段的故事隱去。儘管如此，基督教的大愛和寬恕精神在

電影中得到了放大。姐姐方登最後原諒了她的母親，回到了她的身邊。當中國再次發生地震時，她也加入了抗震救災的隊伍中。當然，電影如此構建，如此有意地移去顯性的基督教文化符號，有助於淡化宗教神性色彩，避免沖淡人性主題，突出社會現實以及傷者自我的重要意義。

誠然，“愛”和“寬恕”並非基督教所獨有，它們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命題。但小說原著中的基督教文化符號，容易讓人關聯到基督教文化的影響。電影雖然去掉了那些明顯的基督教文化符號，但如果慮及作者張翎生活在基督教文化氛圍較為濃厚的加拿大，則也容易體會到其中的基督教文化影響。

事實上，從作者張翎的生活和工作經歷來看，小說中的基督教印痕是非常明顯和確切的。據相關資料，張翎離開中國到加拿大之後，作為成人信徒接受了基督教洗禮，她與丈夫的初次相遇就在溫哥華的教堂裡。張翎作為聽力康復師在多倫多的士嘉堡醫院工作，²³小說《餘震》中的故事多處發生在醫院，其中應該有張翎個人的經歷。

此外，還有電影拍攝與小說寫作時作者的心境和外界時代環境的影響。張翎指出：小說家和編劇或者導演是兩類工作者，用兩種視角展現同一個故事。小說和電影都涉及了創痛和治癒，只是小說完成在汶川地震之前，而電影拍攝在汶川地震之後，所以會有不同的側重。小說側重心靈的“疼”，而電影更側重修復本身。但是，“疼痛”和“治癒”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畢竟，直面災後心靈創傷是重建生活的第一步，《餘震》中王小燈三十多年不能打開心結，就是因為她不能正視並面對自己童年所遭受的創痛。²⁴

張翎的另一篇小說《金山》也被改編成了電影。電影《金山》由中國與加拿大合作拍攝而成，2009年出品，胡大為執導，彼得·奧圖爾、山姆·內爾、孫儷、梁家輝等主演。電影中沒有原著的信息，但從它與小說《金山》的相似度看來，應該存在一定的關聯。估計因為有消息報導說《金山》涉嫌抄襲其他同類作品²⁵，為了避嫌，所以不注明原著信息。但電影與小說同名，而且二者的核心事件都是華工在加拿大修築鐵路，肯定不是純屬巧合。《金山》的電影改編僅僅選取了修築鐵路的故事，隱去小說中大量的原鄉故事和他鄉故事。電影把基督教的大愛和無階級、無尊卑的愛情很好地展現了出來。

三、負面基督教之去與存

長篇小說篇幅較長、容量較大，能夠較為全面地展現基督教的形象，基督教在中國的正負兩面的影響都可充分表現。這些小說被改編成電影之後，其中的基督教負面影響通常大大減少。電影對相關負面描寫往往點到為止，而且還有必要的解釋。

在小說《青春萬歲》中，教徒呼瑪麗是作為一種有問題的女學生被塑造。事實上，她本人沒有問題，她的信仰也沒有問題。小說指出：她的一些錯誤看法和觀念是壞的基督教徒，壞的神父帶給她的。小說用較多的篇幅敘述了李若瑟、康先知等人的不端行為，展示了基督教的負面形象。電影中則只點到了雷姑奶奶，對其他人幾乎沒有提及。

一方面，基督教徒不為一些國人所理解。另一方面，教徒看待中國的事物有兩個視角：教徒視角和非教徒視角。小說提到：一次歷史考試中，呼瑪麗有一個奇怪的答案，被歷史教員送到校長手裡。歷史考試有一道題：“試述義和團鬥爭的始末”，呼瑪麗答道：“義和團是中國最大的教難，魔鬼們焚燒教堂，殺戮主的信徒。許多教徒因而致命。聖母派遣了自己的孩子懲治魔鬼，叫他們下地獄。”在這一段的下邊，又按照教科書答了一段。最後在括弧中注明：“這是按先生

講的回答的。請先生按這一段給分數。”^⑨在《青春萬歲》中，中國人對基督徒的行為和表現充滿了警惕。原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人們習慣以階段鬥爭的思維看待生活中的基督徒的行為。他們認為基督徒的思想有一些偏差，需要糾正，需要幫助。在小說中，校長拿出呼瑪麗的答卷給袁先生看，袁先生目瞪口呆。郭校長湊近袁先生，嚴肅地說：“不是個小事呀！瞧這個孩子中了多深的毒，這當然是教會中的帝國主義分子灌輸給她的。這是教會中的帝國主義分子向我們挑戰，和我們爭奪青年。”^⑩鄭波於是被安排去幫助呼瑪麗。電影沒有把小說中人物的對話完全呈現出來。

小說中的基督徒是憔悴疲憊、病態不健康的。如呼瑪麗，小說這樣描寫她：她有一雙悲哀的眼睛，那長著雙眼皮的眼睛，在她瘦弱的黃臉上顯得過大。它經常是冷淡的，但也有時狂熱；它經常是疑懼的，但有時也虔誠。她左眉心和下巴上，都有小疤痕。她的細小的胳膊，讓人擔心是否提得動那大書包。她的整個身軀，像一株受過摧殘的、缺少生機的小樹。^⑪教會的仁慈堂在《青春萬歲》中是一個黑暗的地方，小說敘述：一九四八年，解放戰爭激烈地進行著，“仁慈堂”的孩子，卻一點也不知道樹蔭和高牆外面的事。由於營養不足和過早的勞動，呼瑪麗長得又瘦又小。但是她的兩隻眼睛明顯地變了，大了，睫毛也長了，不再娃娃似的東張西望。從那時候起，她開始注意地、悲哀地、順從地看著周圍的人和東西了。^⑫同時，小說也告訴讀者，實體的教堂有黑暗的一面，但基督教本身卻不壞。呼瑪麗在《聖經》和教會活動中找到安全感。黃神甫也告訴呼瑪麗仁慈堂不是一個好地方。在電影中，呼瑪麗並沒有如小說所描寫那樣呈現出病態。

小說《青春萬歲》中，有些人對基督教的認識很片面，基督教被認為是精神鴉片。小說敘及：蘇寧打算跟呼瑪麗一起信教，楊蕾雲很生氣，她說：“我真沒想到，萬萬沒想到，我以為你做了合唱團長就能夠大踏步地前進了。……結果你吃起鴉片——天主教來了！”^⑬電影對此也作了淡化處理。

事實上，電影《青春萬歲》中並沒有完全移動原著中的基督教負面形象。這其中有既有人物刻畫與主題表達的需要，也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小說《青春萬歲》中之所以出現較多的偽基督徒的形象，與它對主要人物的塑造和對主題的彰顯有關。小說需要塑造一批思想進步、政治覺悟高的優秀中學生形象，因此，需要給他們設置一些表現的機會。由於宗教生活與世俗生活具有一定的距離，其中必然會出現一些誤解和誤讀，因此，偽基督教和偽基督教傳教士在小說中作為一種與好思想、好行為、好學生的對立面而被刻畫。在基督教的世界裡，傳教士是上帝派來拯救民眾的人，而在世俗世界裡，這些偽基督教傳教士是需要拯救的人。電影由於篇幅限制，移去了小說原著中的諸多偽基督教傳教和神甫的形象，而重點表現呼瑪麗這個傳教士培養的教徒。呼瑪麗在同學們的幫助下，糾正了自己以前的錯誤看法，最終很好地融入了集體生活。這也表明，基督教並非與中國社會和文化格格不入，二者可以和諧共存。

李劫人的《死水微瀾》在改編成電影《狂》的過程中，負面基督教形象的份量也發生了變化。小說講述羅歪嘴給蔡大嫂讀了一篇關於打教堂的文章，這篇文章集中展示了基督教的負面影響。文章指出：教堂該打，道理很多，教堂是洋鬼子傳邪教之地方。我們中國自有我們的教，讀書人有儒教，和尚有佛教，道士有道教，治病的有醫，打鬼的有巫，看陰陽論五行的有風水先生，全了，關於人生禍福趨避，都全了，不再需要天主教耶穌教。中國近年來多遭天旱、水澇，年成總不似以前的好，其大原因，就因洋鬼子洋教之故。所以欲救中國，欲衛聖教，洋鬼子便非摒諸國外不可，而教堂是其巢穴，所以教堂宜打。教堂醫病的藥，據說大都是用小兒身上的東西配合而

成。洋鬼子殺人取藥以治人，縱是靈藥，亦傷天害理之至。教民本天子之良民，只因為饑寒所迫，為洋鬼子小恩小惠引誘以去。好的，存心君國，暫時自汙，機運一至，便能自拔來歸。而多數則自甘暴棄，連祖先都不要了，倚仗洋勢，橫行市廛，至於近年，教民二字，竟成了護身之符，官吏不能治，王法不能加，作奸犯科，無所不用其極。^⑩由此可以看出：在一些老百姓的眼裡，基督教是迷信的宗教，是殺人的宗教，是騙人的宗教，是與中國傳統文化格格不入的異端。小說還敘及：顧天成因為信教而被族人趕出家門，其家產田地也被族人搶去瓜分。這些觀點，電影只是擇要引入，並未完全表現出來。

儘管小說《死水微瀾》展示了較多的基督教負面信息，但它實際上也並不否定基督教。小說對基督教的描述採用的是間接描述和傳聞，並未描述任何一件教會教堂與老百姓發生衝突的事件。這些由小說中人物口述出來的基督教負面信息實際上也在告訴讀者：信息的可信度並不大。在當時，基督教客觀上是借助於條約的保護而在中國傳播，因此，它的勢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與官方保護勢力息息相關。官方勢力強，則基督教的地位高；官方保護勢力變弱，則基督教地位降低。這是基督教在中國傳播過程中的一個歷史階段中真實存在的客觀事實，但這顯然也並非基督教原本的形象。實際上，仇恨、殺戮、欺騙等惡情惡行惡習都基督教所反對的。基督教文化作為一種宗教文化，它具有獨立性和超越性，它在本質上並不會受制於世俗文化。小說《死水微瀾》對基督教的負面信息進行了較多的展示，並描寫了一部分吃教者的形象，如顧天成、曾師母等。其用意在展現中國局部地方在中西文化碰撞中以及社會變革和文化轉型中的景象，其用意並不在抹黑或反對基督教。《死水微瀾》被改編成電影《狂》之後，基督教的負面信息大為減弱。

小說原著《死水微瀾》意在表現，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期，中國的地方民間勢力（四川的袍哥）與洋教勢力的此消彼長對老百姓生活的影響，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描寫基督教勢力在該地的興衰情況。它既是一種客觀的真實，也是一種藝術的真實。由於小說中並沒有出現負面的基督教神父和牧師，也沒有跟基督教直接相關的負面事件，因此，並不會對基督教的形象產生太多不利的影響。顧天成雖然為了個人的利益而信奉了基督教，但他本身並不壞，除了信教之前有嫖與賭的行為，也並無更多害人的事例。電影《狂》在涉及基督教文化時，也注意到了小說中暗藏著的這種對基督教文化的態度，盡可能地略去了原著中的負面信息。

《青春萬歲》、《死水微瀾》等小說雖然描寫了壞基督教徒，呈現了負面的基督教形象，這是由於小說主題表達的需要。這些小說被改編成電影之後，編劇和導演調整了敘事重點，運用了新的敘事策略，使其中的基督教元素份量減少，相關負面影響被減輕。基督教文化被移置，偽基督教元素被移除，真實的基督教得到呈現。

結 語

總體而言，基督教文化在中國當代電影中被移置，其目的是為了突出基督教的積極意義。這種現象的出現，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原因；既有政治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鑒於基督教在當前中國的境遇，預計這種移置現象在中國電影中會有一個長期的存在過程。從隱身到移置再到無變形的彰顯，可反映出基督教文化在中國當代社會中的逐漸融入過程。基督教文化將在文化、道德倫理等領域發揮著治人的作用，基督教文化將與中國的傳統文化一起，成為法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由小說改編成電影的過程中，基督教文化被移置既有現實的原因，也有藝術的原因。假如《金陵十三釵》、《青春萬歲》、《餘震》、《第一次的親密接觸》、《死水微瀾》等

作品在改編成電影的過程中，基督教文化如同小說原著一樣，在電影中呈現，則會有何種效果呢？若如此，則電影《金陵十三釵》一方面會成為妓女蛻變成聖女的讚歌，也同時會成為英格曼神父的讚歌，成為基督教的讚歌。如果《唐山大地震》將原著中的基督教因素加入進來，則由此會附上另外一種信息：基督教可以療治心理傷害。電影《青春萬歲》和《死水微瀾》如果把原著中的基督教因素都表現出來，則它們很可能會被認為是反基督教的電影作品。這些，恐怕都是現在不宜出現的結果。

從《青春萬歲》到《金陵十三釵》，觀眾可以看到，對基督教負面的描寫在減少減弱。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而發生的移置在逐漸減少，因為藝術的原因而發生移置的情況在增多。基督教文化在中國當代電影中，逐漸以正常的形態出現在世人面前。這或許也意味著，基督教文化正在逐漸與中國文化發生新的整合，逐漸融入到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中來。關於這一點，小說方面已有比較多的明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曾經有幾十年的時間裡，基督教文化在中國小說裡幾乎完全隱身。但現在，情況在逐漸發生變化，如北村的《施洗的河》由花城出版社 1993 年出版。該小說以“施洗”作為主題，主體事件雖然與基督教無關，但小說的主人公劉浪後來皈依了基督教，作者北村後來也受洗成為教徒。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莫言的《豐乳肥臀》由作家出版社 1996 年出版，小說中出現了瑞典傳教士馬婁亞的形象。“70 後”作家徐則臣的《耶路撒冷》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14 年出版，該小說獲第五屆老舍文學獎，並於 2015 年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提名。當代先鋒作家余華的《第七天》由新星出版社 2013 年出版。《耶路撒冷》和《第七天》的主題、結構和內容都可見明顯的基督教文化因素。這些情況表明，含有基督教文化因素的小說在慢慢增多，基督教文化正在得到越來越多的中國當代作家的關注。

①②③⑥⑦⑧⑨⑰嚴歌苓：《金陵十三釵》，太原：《名作欣賞》，2006 年第 13 期，第 5、25、15、18、24、9、21、8 頁。

④⑤《聖經》（中英對照·和合本·新修訂標準版），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出版，南京：南京愛德印刷有限公司，2000 年印行，第 117、179 頁。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王蒙：《青春萬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 年，第 65、66、66、61、65、64、276、277、48、48、50、63、179 頁。

⑬黃蜀芹：《真摯的生活，真誠地反映——我拍〈青春萬歲〉》，載文化部電影局《電影通訊》編輯室、中國電影出版社等合編：《電影導演的探索（4）》，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6 年，第 188～189 頁。

⑭蔡智恆：《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北京：知識出版社，1999 年。

⑰張翎：《金山》，北京：《人民文學》，2009 年第

4~5 期。

⑱張翎：《餘震》，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

⑳㉑Leah McLaren：《借來的東西——關於張翎“抄襲”事件的調查》，牛抗生譯，廣東汕頭：《華文文學》，2013 年第 1 期。

㉒劉雪明：《〈唐山大地震〉首映獲好評，原著張翎詳解文字影像之別，小說是疼痛電影是療傷》，烏魯木齊：《烏魯木齊晚報》，2010 年 7 月 14 日。

㉓李劫人：《死水微瀾》，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年，第 40～43 頁。

作者簡介：陳偉華，湖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沙 410082

[責任編輯 陳志雄]